

=====  
文革博物馆通讯（九八三）·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一五一期（zk1811c）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版）

---

## 本期目录

|        |                   |     |
|--------|-------------------|-----|
| 【跌宕人生】 | 走出困沌——我的文革经历实录（上） | 江明德 |
| 【难忘岁月】 | 重回北大的日子           | 胡宗式 |
| 【往事非烟】 | 冀朝铸回忆录（摘译之二）      | 冀朝铸 |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 【跌宕人生】

### 走出困沌——我的文革经历实录（上）

• 江明德 •

## ◇ 前言

七十多岁的人谈个人经历，文革应该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而对我来说文革初期的“失意”遭遇，当时说是“污点”一点不夸张，今天还说“污点”就有点矫情。但是说它是个“斑点”却是实情，因为它是我个人经历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印记。我想通过本篇文稿，把我所经历的文革有代表性的实情实景记录下来，给将来研究文革历史的学者提供可信的资讯，同时给把文革当作天外奇谈的人们一点尚有余温的生活气息。

### （一）我在文革中的几张大字报

#### 1，常二宝日记

1966年6月24日科大626（1962年入学的6系学生——编注）发动的针对工作组的“6·24事件”轰动了全校，令同学们始料未及，随之而来的是工作组发动全校整肃学生群众的将近一个月的“排除干扰”。626不去批斗走资派却把矛头指向领导科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工作组，这就是对运动的干扰，不排除这些干扰，运动无法健康顺利的进行。

反干扰一开始，同学中由于观点态度的不同分成了“反工作组”的少数派和“保工作组”的多数派。工作组未撤走前，少数派由于还有原基层组织的管辖大都不露面甚至不敢公开直言自己的观点。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传出来以后没多久工作组就撤走了，少数派一下子活跃起来，又是大字报表态又是相互串联，原来的多数派对运动发生的突变很不适应，仍然对少数派持抵触反对的态度。我的大字报“常二宝日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

大字报假借一位多数派同学常二宝之名，叙述了被裹挟参与“6·24”事件的不情愿，对反工作组同学的批驳，对工作组“排除干扰的”支持以及面临工作组撤走以后运动去向不明的担忧。大字报名为常二宝日记实际充满了对他夸张的讥讽，当时写出来贴出去自己很得意（而且还用了一个很雅致的笔名雨花石），没有想到这种影射的表达方式却给了对立观点的同学深深的伤害——于文革运动无益，于同学友情有损。

其实好长时间以来我并没有认识到这些，直到将近30年以后的一天，我在南京五台山江苏省体委大楼偶遇借地办公、时任江苏省质监局主持党政事务副局长的6262同班同学张腊狗。

那天因为自分配离校以来隔时旷久的第一次碰面无话不谈，自然也说到在科大文革中的琐事。腊狗提到文革初期那张“常二宝日记”大字报。他说虽然事情就是那样，文革过去都快20年了，但是那个大字报文字太刻薄，有些话说得太恶毒了。事情是我做的，只不过我是施力者，别人是受力者，自然感受迥异。但是对方反感之深重还是给了我强烈的冲击。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当即承认了我是大字报的作者。腊狗回应说没有想到雨花石就是你，但是你讲明了，回过头来一看，文字语言的确符合你的风格。我真的是这样：在同学中太高傲自矜，律己有度却约人无边，遇到同学的缺点瑕疵很少掩爱庇护反而动辄讥讽，无形中给别人带来的伤害常常不能自觉。

又是20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腊狗对我大字报的批语，依然难以忘却，我需要对当年被我用大字报攻击挖苦过的同学说一句——“我真诚向你们道歉”。

## 2，刘达不是黑帮

刘达不是黑帮！欢迎刘达同志加入到运动中来接受教育。——署名：6262江晓东 魏尚丰。

1966年7月的科大校园里出现了一张这样的大字报，在漫天遍野打倒牛鬼蛇神狠斗黑帮的口号声中它是一支极不和谐的音符格外引人注目。

这张大字报贴出后，既没有响应附和的，也没有批驳反对的，有意思的是私下里来访者络绎不绝。几乎所有来访者都提出相同的问题：你们凭什么说刘达不是黑帮，有什么内部的材料和根据？我们的回答很简单：这是我们根据党的一贯政策和开展群众运动的需要从自己的认识出发做出的判断，我们没有内部材料。这样的回答不免使来访者失望，由于回答本身过于原则，也让他们很难对大字报的内容明置可否。

“刘达不是黑帮”这张大字报在科大文革运动中只是一个小小的浪花，它所起到的作用可以微小到忽略不计。但是，它在一个人政治生命沉浮记录中却留下了不能忘却的记号。这个人就是大字报标题句子的主语——刘达，文革爆发时面对群众运动首当其冲的科大党委书记。四人帮被拘文革结束以后，被打倒的大批领导干部获得解放，刘达也曾好奇地问过运动中保护过他的科大626学生：这个江晓东、魏尚丰是什么样的？

说到这张大字报的产生必须提到一个人，他就是当时华北局书记，后来的北京市委代理书记李雪峰。

当时我们从四清工作队回科大以后跟原来分团的北京队员还保持联系。一次在京西宾馆和他们见面时获得了李雪峰在华北四清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内容。其中有一段话对我们认清文革初期的形势帮助很大。李雪峰说，运动一开始群众起来了，有些领导同志不理解跟不上形势，成了群众的绊脚石，妨碍运动的开展，就要把他们搬开。李说，就同以前华北土改时一样，那次开始就是搞了“搬石头”，谁阻挡群众就把谁搬开。依照这个说法，作为绊脚石被搬开的人并不一定就是革命的对象（敌我矛盾），他们只是因为不理解阻挡了群众，如果随着运动发展他们认识了自己的问题摆正了与群众的关系还是能回到革命队伍中来的（人民内部矛盾）。本着这个认识，我们认为刘达就是被搬开的石头，所以不是黑帮，因此就有了前面说的那张“刘达不是黑帮”的大字报。

如果要说什么有“内情”，也就是这点东西了。不过当时我们并没有给大字报的来访者透露过李雪峰的这段讲话，也算是悄悄留下了一个“包袱”。

### 3，中央文革为何批评不得

1966年10月以后北京的文革运动似乎进入了一个死胡同。各单位的走资派成了死老虎再也不能引起造反派对他们新的揭批兴趣。朝令夕改断续无章的“最高指示”常常弄得人们无所适从。手执尚方宝剑的中央文革颐指气使、“首长讲话”满天飞。无产阶级司令部刚从广东调来的陶铸没几天就被宣布成了“保皇派”。首都三司虽然成了引领北京造反派学生的御用一把手，但是面对人数众多、完全持对抗态度的多数派，它也是无能为力。大多数群众面对混沌的形势对运动的去向产生疑虑和不安。原来拥护工作组的多数派学生面对冷眼相看他们的中央文革感受到被组织和领导层抛弃的痛苦和失落，因而在他们当中酝酿着对中央文革的失落、愤懑、抵触和抗议。

自古英雄出少年，北京中学生红卫兵首先向中央文革发难。中学生“联动”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召集“破私立公大会”，喊出了“坚决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和“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将矛头直指江青。北京林院6个战斗队联合贴出“踢开中央文革小组紧跟毛主席闹革命”的大字报，公开表明“中央文革小组的产生是不符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的精神的”。

面对满社会对中央文革的批评意见，我对照文革运动纲领性文件和毛泽东的一贯教导做出如下的判断：1.文革小组偏离了十六条，对运动的指示有太多的随意性；2.文革小组对待两派革命群众亲一派打一派，处理两派矛盾时“拉偏架”；3.文革运动偏离了十六条，中央文革有必要听取群众意见改弦更张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4.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文革小组对当权派动辄批判打倒，而它自己对来自革命群众的批评意见却视如洪水猛兽一触即跳，这不是马列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根据这样的理念我写出了署名江晓东的大字报，标题就是“中央文革为何批评不得？”

### 4，对尖端观点表态

1966年的12月是北京文革运动的寒冬季节。造反派组织在中央文革的支持和鼓动下对反文革小组的群众组织采取高压批判的政治态势，而且为控制局面开始直接抓捕其中的核心人物来震慑对中央文革和造反派心怀不满的人，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怀着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心，认真比照运动指导文件十六条对中央文革提出批评意见，这样的革命群众居然遭到造反派的抓捕受到专政机关的关押，我问自己：文革运动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

文化大革命本来是要发动群众来参与的，现在搞成了万马齐喑人人自危，说话不小心会被扣上“反革命”帽子，如果不“认错”继续发声辩解就难免被抓捕的厄运。

直到今天我自己也解释不清为什么这种黑云压顶的苦情难势反而激励了我勇于公开表达自己真实的政治见解？后来在北京看守所认罪检查时我曾经有“政治虚荣心”“好表现”一类的自评自述，但其实仅用这些连我自己也不能说服自己，比较意思相近一点的恐怕还是这张大字报的最后一句。下面还是先来谈谈这张名为“对尖端观点表态”大字报的实际内容吧。

1.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首先，世间万事万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其次，某一事物如何一分为二应该是它本身存在的二重性，并非如世人所想所说“非是即非”“非黑即白”这种庸俗的理解。至于毛泽东思想如何一分为二，本人水平不高、能力有限，有心无力解答这个问题。

2.林副主席能不能怀疑？首先，林彪作为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文革副手未来党的接班人，我不怀疑。然而，农大附中的伊林、涤西两位中学生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怀疑林彪是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们的出发点是难能可贵的。如果事实证明林彪符合毛主席关于革命接班人的5条标准而为全国人民接受，那林副统帅的威望不是更高了吗？

3.中央文革能不能批评？这个问题的回答上文已经尽述，不重复了。

这三个问题在今天看来如同问“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吗”一样，回答应该是直白简单的。可是在1966年的文革开始后的冬季，在那“红色恐怖”临头盖地的关口，面对这样的问题暴露自己的“尖端观点”谁都要头皮发麻。可是当时的我还是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地、冒失地表态回答了。原因是什么？大字报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旧社会教做人“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我今日反其道行之，要做“逢人敢说十分话，对党全抛一片心”。

## （二）从“十二月黑风”到科大雄师

### 1，一条符合逻辑的发展路线

1966年12月北京这股抵制中央文革的群众潮流后来被造反派污蔑为“十二月黑风”。从反感造反派的钦差鼻息和救世主姿态到厌恶文革小组的目空一切、恣意胡行；对领袖“最高指示”“传达不过夜，宣传不漏人”从盲从到厌烦，这厢刚刚贯彻执行忽然又来了叫你反戈一击的新“最高指示”，经常弄得“人人站队，个个检查”……

所有这些都推动我同情质疑中央文革的声音并且附和他们的诉求，直到1967年元旦读到科大雄师发表的大字报“中央文革向何处去？”我才真切的感到：这就是自己不安灵魂的归宿。

我找到四系朱军的宿舍，向雄师战斗队的同学表明自己对中央文革所持的批评态度，表示愿意参加雄师和他们一起战斗。即使持这样观点的目前六系很少而626只有我一个，我

也要孤军奋战。我的大字报战斗队就叫科大雄师大江纵队，出版油印小报题头就印《大江评论》（字体套用选字毛体）。

## 2，雄师的一个小胜利

1967年元月5日上海风暴以后，科大造反派组织有借外校北京三司力量压制科大雄师的打算。大约10号左右，雄师成员获悉有外校人员即将进入科大以辩论为名对雄师成员进行人身限制。科大雄师及时利用同学中同情者在科大广播台工作的机会通过广播向科大全校同学发出紧急呼吁，希望听到广播者速到教学大楼阶梯教室听取情况通报。由于采用这一非常措施，雄师有效揭露了科大东方红即将实施的幕后动作，取得相当多数中间群众的同情和支持。东方红方面一时措手不及未有应对，事后汲取教训加强了对广播工具的控制。

## 3，雄师的第三张大字报

上海“一月风暴”之后，中央于13日发出“公安六条”，把攻击毛、林和中央文革一律划为“现行反革命”。科大雄师感到政治形势的严峻，面对造反派气势汹汹的攻势甚至连自辩的机会都没有了。“公安六条”出来以后科大东方红对雄师态度由反对、打击错误思潮升级到镇压反革命。为了表示雄师的磊落坦然，由我提议贴出“毛主席万岁！人民万岁！”大字报，这是雄师的第三张大字报（1967年元月13日晚）。

14日上午部分同学在朱军宿舍讨论，提出既然造反派要镇压雄师，要抓我们，不如我们自己主动到公安机关去要求坐牢。这也是一种被动反抗和自卫的手段。因为进了专政机关，他们总要依法办事，那时我们就有了辩论和自证清白的机会。可是讨论中，又有人认为跑到公安机关要求坐牢又会给反对雄师的人反扣我们“向专政机关施加压力”帽子的口实。因而以上建议未被采纳，但不少同学还是做了被抓的最坏准备。

雄师的第三张大字报是与中央文革做抗争的科大雄师深陷困境最后的呐喊，而在后来接受批判时却被造反派讥讽为“最后的哀鸣”。两者说法虽然不一，但不能否认的：一是它表达了对毛泽东的忠诚，再就是它表示了和群众一致的声音。

（注：到此为止，我的文革大字报基本终结。以下文字为叙述科大雄师被取缔过程以及我呆在半步桥北京看守所的日子和返回科大以后等待毕业分配前后的似水流年。）

## 4，科大雄师被取缔的历史截图

一纸通告勒令听训。元月14日科大东方红宣布取缔反动组织科大雄师。晚饭时在六系食堂过道里张贴了一张署名“东方红战斗兵团镇反办公室”的通告：“勒令江晓东于××时间到东方红总部本办接受训话交代问题”，我当时并未理睬。

晚上将近11点，我宿舍响起敲门声，来了东方红的二人说带我到他们总部“谈话”。我跟他们走出宿舍时对我班同学示意我带上准备好的物品，我即返回去从书架上取下装有洗漱用具的挎包跟随他们走出六系学生宿舍楼。科大教学大楼零星的灯光照着正门前停着的一辆大巴，路过大巴时陪同一路的东方红二人连拽带推把我送了上去。登上车的一刻我的心脏仿佛突然收缩猛的悸动，全身也不由自主的发冷颤抖，待到镇静下来我发现车上已有雄师的同学被“看护”着并且陆续还有人被押解着登上这辆车。

从群众“揪送”到公安接收。当晚科大共抓5人：朱军、周平、冯正永、江明德和黄晓光。由于惊动了全校，以三系部分同学为主的众多科大同学反对东方红抓人，堵住了学校大门不让大巴开出去。几经折腾载人大巴乘大多数同学不注意从围墙东面一个边门开出学校。汽车往东驶过复兴路沿长安街直接开进天安门广场东北角的公安部大院。科大东方红向北京公安局方面做了交接，然后由警察一对一的牵着各人衣袖带我们到一个像小礼堂的房间。那里已经有七、八个人睡在地铺上，我找一个空铺位和衣盖被躺下。

终于到了半步桥。不到半个小时，来人叫我“起来”跟他走。于是又被牵着衣袖出来，走到一辆苏式嘎斯69吉普车，公安打开后车门。上车后我直接坐在车后侧面的凳子上，谁料一个公安从旁一推把我挤到两凳子之间空处，让我“蹲着”。车开动时公安喝一声“低头”并且用手按了一下我脑袋，车子开动后我就不知道方向了。后来知道开到北京城南的陶然亭附近的半步桥自新路1号——北京看守所。到那里登记、清点寄存物品。几个人一起上吉普车的我已经不记得了，弄完了由一位公安带往监室。当监室门在我后边关上的时候我才发现窗外已经天色微明，是15号的早晨了。此时我感到全身格外的轻松，几天来的紧张情绪一下子放松了，首先想到的是——先睡一个安稳觉吧。

### （三）半步桥的日子

#### 1，筒子里的“规矩”

从1967年元月15日（上海一月风暴以后不久）到同年5月25日（北京市革委会成立一个月以后），我在北京市看守所“呆了”整整130天。关于这一段经历我以自己亲身感受以及后来所了解的谈谈个人认识。

先强调一些这里面的专门用语。通过这些用语可以看出当时各方力量综合作用于这些抵制中央文革的青年学生的最后效果。1.科大雄师当时被定为“反动组织”，因而被“取缔”。2.科大雄师5人是被科大东方红“扭送”公安部门，由北京市公安局对他们实行“拘留审查”。3.他们罪名是“犯了反革命性质的错误”但是可以“通过认识错误，化敌我矛盾为人民内部矛盾，再回到文革运动中去”。（据说当时抓我们进去后，造反派一个大目的就是挖后台，看有没有高干在后面支持。后来看到我们全都是市井小民出身与高干一点瓜葛也没有，捞不到“油水”，也就失去追查后台的兴趣了。）4.文革中的“闹事”学生被单独关押在一个个“筒子”里（与社会偷盗毛贼分开）。监所建筑如同海星呈放射状，中间一个标准6边形的厅，朝南的一边平行向外成为进出的大门。其他五个边辐射向外推进构成长长的对面开间监室“筒子”（两侧监室，中间走廊）。这五个边处就是五个“监筒”的铁栅栏门，看守员的值班室是筒子里面紧挨铁门边的一个形状为三角形的不足3平米的小屋。5.看守值班不穿警服以示非正规执法。根据规定看守员不许叫“看守”只准称呼“管理员”，每次预审叫“谈话”。6.关押期间伙食每天两餐1斤1两粮食，早餐稀饭窝头，下午餐馒头，副食早上是酱咸菜下午是千篇一律的白菜羊肉末。

#### 2，三次“谈话”三张面孔

我记得总共被叫去谈了3次。第一次在被关后不久，预审员为大约40岁中年男人，核对我的身份后，他劈头劈脑的问了一句“你们怎么搞的，都反到她头上去了？”语气感觉是一种同情责备。（因为文革中各单位都有两派，而反中央文革和反江青是同义语）。第二次，是一个较年轻的加上科大东方红的一个学生。这回态度比较凶，一上来就是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除追问有没有人背后支持外，就是找我反中央文革的“罪证”。记得那个科大东方红学生可能是湖南人，居然理解我一首词里“此地亮壳正

红”句中“亮壳”即灯笼，是影射科大红灯组织（科大东方红成员之一）。并直接指出另一句“灌杀土狗叶儿碧”中之“土狗”即恶毒影射中央文革。我说不是，系指刘少奇，他说我狡辩要打掉我的嚣张气焰。第三次是一位中年妇女同志，这回气氛缓和多了。上来就是念“犯错误改了还是好同志”的语录，一听就知道“拘留审查”快收场了。申明一下，第三次谈话前我已经书面检查表态自己“犯了攻击中央文革的错误，干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部署”。不像之前那样的“顽固不化不认罪也不认错”。

### 3，“低头认罪”——拘留审查的终点

关押初期我总以为可以期待法庭辩论申诉理由，其实这一仗如何打完全由不得我们。第二次“谈话”中公安直接公布了我的5条罪名——1.散布贬低毛主席的言论；2.同情有损林副统帅威信的大字报；3.攻击、反对中央文革；4.攻击、反对革命造反派；5.攻击、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公安还特别指出：虽然你的反动思想很隐蔽，但是你的反动理论很系统。公安反复提示“只有承认错误才能化敌我矛盾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而我开始想不通：“为什么只是批评几句，就成了反对”；“我是言者，不是行者，言者无罪嘛”。就这么僵持着好长时间，后来随运动发展自己认识逐渐发生变化。

我想到自己奋不顾身投身运动，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和路线，一腔热血倒成了反毛泽东路线的罪人。叫自己理解——自作自受；让别人理解——不可思议。虽说是一路忘我奋斗但是跌跌撞撞走到今天终归是一种并非初衷的结局。

当时感到，坚持原来观点是很艰难的，后果难测。而且这样做已经知道不是让毛泽东高兴的事，那最终又是为了谁？“认错认罪”则是顺坡出溜很容易的事，再往下则顺其自然了，那就选择“低头认罪”吧。

### （四）陶然为邻

呆在看守所的时光并非终日的挨训和写检查，如同蜗牛也有春天，被困青年学生也有着和他们年龄相称的荷尔蒙。即使人被关失去了自由，踊跃向上的活力在生活中仍然以它别样的方式表现出来。

#### 1，同室“难友”

我所在的监室原来住着两位中学生和一位门头沟煤矿的工人（厨师），我进来之后总共4个人，也就达到满员了。中学生年龄小的叫秦小浩，父亲秦力真在外交部供职（驻赞比亚大使）。小秦说他是“7434部队”的（气死三司），就是所谓的“联动”。大一点的中学生名字忘记了，长一副很文静的面孔。他说是“西纠”的，也是早期中学生红卫兵的纪律部队。两个人都是夜间活动被“三司”逮住送来的。那个工人是参加本单位造反派去市公安局的“砸局抢档”行动被抓的。

#### 2，监室内外

记得我是关在看守所的“13筒”。监室为宽约2米纵向不足3米的矩形空间。一个约30公分高的木质地铺占了将近四分之三的地面。紧挨着门的墙角放一个铁皮尿桶。地铺靠墙处是一个蛮大的窗户只是窗台略微高一点，说窗户够大是因为白天即使不开灯房间里也有足够的亮度。因为挨着值班室也就离筒子楼的大门很近，从窗户可以看到看守和预审员走进走出。窗台下的墙壁挂着北方常见的暖气片。冬季的监房里有足够的温度，只穿绒衣不穿棉

袄也不觉冷。从铁皮门上的小窗向外看对面一字排开六七间监室和我这边的监室门门相对。相对的两排监室之间是空荡荡的走廊。走廊尽头一侧有一间设计成厕所，仅在被关人员需要出恭解大手时，本人报告管理员批准后才可以出监室前往使用。在走廊另一头的筒子铁门内与厕所遥相斜对的位置，是一个无窗无暖气的三角形空间的黑屋子（终日需开灯，冬季用煤炭炉子取暖），用作管理员的值班室。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半步桥自新路1号不光是看守所，看守所可能就我们这一座五指分岔的筒子楼，之外还有多座零星分布的方形火柴盒建筑，那是判刑伏法的牢房，从外面看窗户很小。

### 3，洗澡和放风

冬天大概两三个星期可以洗一次澡。每次洗澡也是大伙心情最放松的时候。水蒸气弥漫的澡堂子里人虽然多但声音并不嘈杂，有些平时只在走廊里匆匆见面的“难友”此时可以悄悄的交谈几句。大多数人则抓紧时间洗好穿衣集合一会儿就回去了。再一个可以自由活动的机会就是“放风”了。说自由其实也极有限。场地是利用五指分岔建筑的两指岔间，也就是两个筒子分岔处的空地。同一个筒子的关押人员排成一行首尾相连成为圆圈，在三角形的草地上慢慢地踱步。有管理员看着不许说话，想表达的只能用手势和眼神。时间在一刻钟以内，虽说不长，但是终日被关在“号子”里的我此时能在阳光下伸伸胳膊蹬蹬腿也是难得的锻炼机会。

### 4，打牌抄菜谱

平时写检查的间隙，有人将白稿纸折成田字格一分为四裁开当作卡片，画上红、黑桃和方块、梅花加大、小王，就成了玩具扑克牌。晚上休息时候玩玩牌，只要不大呼小叫看守也不会干涉。时间和精力还有富裕的时候，那就练练硬笔书法。书写的内容由当厨师的工人师傅提供，请他详细报菜谱。书写规格是一律的仿宋体，一横末端的“顿”和一竖终了的“提勾”都写得中规中矩。有写的规范漂亮的居然不光本室作为字帖范本传抄，甚至室与室之间亦有争相借阅临摹。

### 5，墙外就是陶然亭

从窗外不时飘来广播的乐曲和激越昂扬的语音播报——“亲爱的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听多了就听出来了，这是陶然亭公园广播喇叭的声音。这里居然紧挨着公园，墙外就是陶然亭！那可是民国文学青年高君宇和石评梅驻足徜徉、论文评诗的所在，居然与我们因言获罪所陷囹圄的关押地一墙之隔、半步之遥。我想当时如果有现在的网络用语，那一定会脱口而出——“我去，太讽刺了”。

### 6，释放联动

一天下午，晚饭刚吃完管理员就在每间监室的小窗口发布一则内容相同的通知：所有在押的中学生穿戴整齐等候集合外出。外出干什么？没有说。果然到晚上六、七点钟时分，有人来到筒子里带人，管理员打开一间间监室门锁，报名字提出中学生，来人清点列队，小家伙们一声不吭规规矩矩鱼贯步出筒子的铁门，出了看守所的楼门走下台阶消失在我们窗口所能看到的墙际线……。



筒子里一下少了小半数的人，空旷的走廊里回响着管理员来去走动的脚步声。他不时提醒各个监室：“安静些，不许乱议论”！监室里没有外出的人对面相坐，暗自猜测对这些孩子们可能发生的一切。因为除了“开会去”三个字之外谁也没有得到更多有用的信息。

从概率的正态分布出发，基数越大担责越小。所以我感觉这么多中学生去开同一个会，如果是坏不会大，如果是好则不会小。我甚至用上了初中从同宿舍同学那里学来的阴阳先生的“掐指打时”，给同室那位厨师工人露了一手。根据农历月日我掐算的结果是“大安”，对应的谶语为“大安身不动，行人在当中”。可以解释为：稳，较好，不出格。结果后来工人师傅骂我：你给人家算得好，什么“在当中”“不出格”？人家都放出去了。反倒是你自己还关在这里，是没有“出阁”，是“还在当中”！算的准与不准关系不大，但这件事弄得我好没面子。

晚上直到11点半多，中学生们终于回来了。进门第一句话就是“哈哈，我们回家罗”。原来他们参加了一个人大会堂的中央首长见面会。文革小组的成员挨个发言，说是北京市革委会成立了，形势一片大好。你们小家伙也不要再胡闹了。认个错放回家，回到学校还要投入运动，继续革命立新功。就这样，我们监室的小秦和另一个中学生急火火的收拾自己的物件，向我和那个厨师匆匆告别。我还借穿着那个中学生的一双解放鞋呢。他说你留着吧，我家里解放鞋多着呢。这一夜先是在猜想中静静的等，后来是替别人高兴期待复制自己相同的命运，亦喜亦愁，昏昏然直到天亮。

## 7，揪回科大挨批斗

揪斗是文革中经常采用的一种批判形式。第三次谈话之后不久，一天我接到通知，次日我要回科大接受全校革命群众的批判。第二天上午捱到快十点了才等来预审员提我出筒子。我们先上了一辆嘎斯69，这回让我坐在车后侧面的条凳上了而且没有要我“低头”。到前门那里的市局办事处见到了学校派来的群众组织代表，原来是我们626在东方红兵团的两位同学。我和他们连招呼也没有打，囿于形势相对无言，当时可以理解，现在也无话可说。一辆黑色上海牌轿车载着我们驶往玉泉路，我坐在车后座中间，左右分别坐着两位同学。车到学校一直开到教学大楼东侧的门洞，下车后我被陪送到4楼一间很大的实验室。安顿下来，已经是正午时分了。过了一会，和我同宿舍的同学为我打来了午餐，两只白色的搪瓷饭盆扣着，打开一看是热腾腾的三只包子——当天我们六系食堂午餐供应的是西葫芦大肉包。平时午餐定量是4两，三只6两，超量百分之五十了。好的，我欣然接受，算是“优待俘虏”吧。午餐之后说是要午休，批判大会要到下午过两点才开。这时同宿舍同学又给我送来了从元月15日至今积累的家信，其中包括我的恋爱对象的信。

批判会的时间终于到了。我由东方红的几位学生押解着去到学校大礼堂，行走的路线沿着宿舍楼到食堂的水泥路一直向南，然后右拐向西，再左拐向南至大礼堂西边门，由通往后台的后侧小门进入。一路上我看到水泥路横向缝隙隔开的一个个大方格子里，每个方格只写一个大大的黑体字。连起来是一句口号：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江晓东！快到礼堂西边门时隔着两边的冬青树忽然围上来许多人。押解我的东方红战士怕我挨打赶紧簇拥着往后台小门走去。匆匆忙忙人声嘈杂，慌乱中我感觉到后颈脖上沾了什么粘液似的东西，用手一摸是一团痰液。狼狈之中我胡乱用棉衣袖子擦去污物，在群人裹挟之下挤进了礼堂后台。

下午群众大会批判的对象有两个，一个是黄晓光，另一个是江晓东。黄的批判安排在先，我站在幕后看着等。我看到黄一个人站在舞台中央靠前处，有没有挂牌子我从后面看不清。发言的人站在舞台正中对着麦克风慷慨激昂的念稿子喊口号。

过了约莫一小时多轮到我了。押解的东方红战士交给我一张四倍 A4 纸那样大小的纸片，中央横书江晓东三个大字，再上面是一行小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批判开始了，我低头站在那里，双手拿着自己的“名片”举在胸前。发言的人一个个从我身后走过去，听声音有两位是我本专业的同学，其他的我都不认识。发言内容批的全是我大字报上说的话，指出我的罪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公安说的一样）。整个下午的会进行的很有秩序，对批判对象没有采用常见的“喷气式”一类的体罚，我想或许是由于我们都带了一条“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尾巴的缘故吧。

## 8，没事找事

自打写了“认罪认错”的检查，感觉心里的“坎”也过去了。不用整天想着“抵制”什么、“坚持”什么，就像是大师们说的，“放下了”。从这以后心里也不烦了，吃饭也香多了，以至后来每天感觉饿得慌。（这中间我跟同监室的“难友”曾经设计多打一份饭菜，成功实施了好几天。）。于是没事找事，想起给看守写报告要求提高伙食标准。隔日，那位年长的“管理员”（我们给他起外号大背头）把我叫出来，到他的值班室谈话。他说，你们就好好认错写检查得了，不要再闹事。你们这些学生早晚还要回学校去，依照你们要求如果把伙食标准提上去，将来那些偷鸡摸狗的家伙进来，你们不是给这些人做了好事情？想想也是，认错作罢。他把我的报告当面撕碎，说就这样吧，你回去。戏剧性的是，回到监室不到半个时辰，管理员出现在我监室铁皮门的小窗口：“江晓东，准备东西！”我知道，就是要放我回学校了。

## （五）放回科大

### 1，书箱平安铜锁依旧

1967年5月25日，历经130天的“拘留审查”我终于由北京看守所释放回学校了。早饭后不久管理员打开监室，预审员来提人。先是去取回存放的物件（进来时挎包里装的口琴、日记本之类是不可以带进筒子里面的），然后还是沿着批斗那天的路线，乘嘎斯69到前门公安办事处。来接我回学校的还是上回那两位626同学。小车这回是开到科大7号楼——六系男生宿舍楼，把我直接送到原来的学生宿舍。推门进入宿舍，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上铺床枕头旁边的小木质书箱。挂在箱盖搭扣上的小铜锁安然依旧，仅此一景让我心中无限感慨。也就是说，江晓东即使被抓、被关、“拘留审查”，甚至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但他的宿舍没有遭到“查抄”。由此可以想见，科大东方红和626的同学们对江晓东的认识是有政策原则的，是有底线的。那个时代，谁要是言论“出格”被人抓住把柄，抄家翻个底朝天，找几条日记语录上纲上线把他打成“黑线人物”、“叛徒特务”、“反革命”，真是家常便饭屡见不鲜，而我却幸运的没有遭遇。

### 2，继续革命

虽说是回到学校投入运动要继续革命，其实难度很大。自返回科大直到毕业离校，除了68年8月和68年12月在626年级范围内的两次公开检查，我没有再受到批斗一类的“待遇”。我自己愿意投入到运动中来，而且就当时的认识而言我总体认可科大东方红的观点。可是我不得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某些事务由于有江晓东的参与很可能留下戏说的话题或追究的把柄。我出的力不只是会成画蛇添足，还有可能把一件平凡无奇的事情弄成众矢之的。所以同学们很多的繁杂事情我也只能干看着。对于他们来说，我最好的支持就是什么都别做。

### 3，对话新兵

从68年夏天起，军宣队工宣队陆续进驻科大。我们626年級的军宣队领队是一名年轻的下级军官，广西人。中等个子白净的脸，像个小知识分子。和同学们接触既没有刻意的亲和也没有盛气凌人的威逼，倒是在例常的宣讲政策之余，有闲空他会来到宿舍跟我们交流阅读红楼梦的心得。

领队手下是一水的新兵战士，一看就是来自边远地区的农村青年，有些连普通话也讲不好。一天，领队通知我有两位军宣队战士要找我谈话。我走出宿舍，两位正在楼道里等着。他们径直把我带到科大运动场北面的小松林，找个小石桌三人围着石桌找凳子坐下。一位小战士对我说：我们听说你犯了反中央文革的错误，你给我们说说为什么要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我回答说：我犯错误有个过程，自己认识错误的严重性也有个过程。我问他们，我按照事情发展的时间顺序给你们讲，行吗？他们说可以。这样我就从南下串联讲起，北京的造反派怎样到处煽风点火、打倒一切，各地的工农子弟因为给省委说了好话被扣上“保皇派”的帽子如何受压制，中央文革怎样袒护造反派和冷落保守派群众。中间讲到北京中学红卫兵跟中央文革的冲突和北京造反派压制群众打砸对方组织乱抓人的过激行为。最后讲到由对造反派的反感和对保守派群众的同情导致了利用大字报非议中央文革犯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错误。我说，我父亲是城市店员，家庭出身也属于贫下中农一类，从小学读到大学都是党的教育，对党和领袖只有热爱的感情没有反对的仇恨。我是把中央文革当作党中央的参谋部来看的。参谋给司令员出主意也有可能出馊点子，如果做的不对批评他几句不算什么。当时就是这么想的。要是像现在你们这样认识，知道中央文革也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部分，我怎么也不会去触动它，去做让毛主席不高兴的事。所以我错了，我知错认罪。讲的过程中，他们有听不清楚不好理解的地方，我都一一耐心的给他们解释。最后，小战士对我说：你这一讲我们都知道了，回去好好改正吧。

### 4，腰杆要挺直

从看守所释放回科大之后乃至毕业分配到陕南，我对文革开始这一段“失意”经历有着自己严格的定位——我认为即使是犯严重政治错误也是“光明的错误”，是政治的污点而不是偷鸡摸狗蝇营苟且之事，用不着自卑或者人前矮三分。所以我照常学习工作，努力关心政治，敢于发表个人见解。

自己正确地看待自己的错误挺直腰杆做人，自然也会因此获得别人的尊重。当然，能够产生这样的良性循环也得益于科大626这个集体以及科大东方红勤务组成员和六系军宣队工宣队的解放军官兵和工人师傅们在文革中对于人性底线的守望和呵护。

### 5，学友谏言

68年的9月终于迎来了科大62级的毕业分配。随后的情节就像是电视剧里导演安排好了似的，系里刚向62级同学传达科学院各专业研究所对科技人员的补充需求，方便同学们填报志愿时作为参考，那厢里马上传来知识青年要“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厂矿、面向基层）的最高指示。于是毕业分配的画风大变，原来的分配大方案搁置封存，一切后续的安排部署完全遵照最高指示精神执行。领袖一挥手，河山尽改颜。自此，科大62级以及此后各届在文革中的毕业分配去向便与60级以前的分配去向迥然不同了。

另一方面，由于毕业学生中有少部分因个人或家庭的问题相关政策尚未确定需要滞留学校等待政策落实后再分配，因之造就“待分配”一族，而我是所有“待分配”同学里排名最

靠后的。当离校的日子终于到来的时刻，6262专业的同学出于对我真诚的呵护和关心，在一对一的告别谈心时都给我留下诚恳的忠告和劝慰。其印象深刻者谨录于下。王永民：列宁说过，历史有时候会和人们开玩笑，明明你想走进这个房间却走进了那一个房间——记住这个历史的教训。屠衡沧：在学校里你犯了错误，别人把你当作学生看待可以原谅你。走向社会你成了应该自负责任的青年，别人不可能还这样对待你。好自为之。张腊狗：你那些观点其实大家也都这么看的，何苦你非要写下来、贴出去？这样的错误你只能犯一次，以后不要再任性了。言之谆谆，听者诺诺，都是肺腑之言，都是为人之道。

## 6，冬日的阳光

首批分配的同学陆续离校，留下我们这些“待分配”的在漫长的日子里苦苦等待。我由于个人特殊的原因，不得不做好接受一切可能发生情况的思想准备。因为有“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判刑不大可能，但是可以送交劳教，可以遣返回乡，还可以给自食其力的工作同时接受管制教育。我个人做了最坏的打算，可是我从系领导小组负责人前系党总支书记宣亚静那里得到的消息却是情况在向好的方面发展。我多次问过宣书记关于毕业分配对于我是什么政策。她总是回答说，现在还没有明确下文，不过你不要着急，会有一个满意的结果的。好像抽了一个上上大吉的签就是看不到签文，心里不踏实。“问题学生”的毕业分配虽说还没有明文规定，但是传出的消息却是说老师们和几个副总理对此事一直很关心，顶着压力不让文革小组干预大学生分配。这就是冬日里从乌云细缝投落大地的一束温暖的阳光。

夏去秋往冬又来，又是一年雪花飘。68年临近年底终于等来了落实政策的大学生分配原则。宣书记向我传达了国务院李富春副总理的指示：对于那些在运动中犯过错误有悔改表现的大学生，要给出路。对他们要“一视同仁，照常分配”。

在所有待分配同学看指标填志愿忙碌时，这里没有我什么事。年级负责人李津生同学和工宣队的老师傅分别找过我，要我准备在626全体待分配同学大会上再做一次检查，他们都强调“态度要诚恳，认识要深刻，争取一次通过”。因为只有在年级全体革命群众大会上的检查获得通过，我才有参加毕业分配的资格。于是，我开动脑筋深挖根源，写出书面检查并且在年级大会上公开宣读，最终获得大家的谅解和通过。没有想到的是，节外生枝又弄出个意想不到的新麻烦。

## 7，“偷听敌台”

本来工宣队已经通知我说检查通过了，剩下的三个志愿去向让我挑选一个报给他们。第二天晚间快到熄灯时分，年级里给我传话叫去工宣队办公室一趟。还是那位给我布置检查的工人老师傅，这回的表情一脸严肃。开门见山就问我：同学中有人检举你偷听敌台。你自己说说。一听这话，我就明白了他说的是什么。我回答：是有这事。工人师傅：好，那你自己说清楚，究竟怎么回事？于是我给工宣队做了如下的“交代”。

运动进入“复课闹革命”期间，男同学里时兴起自己安装半导体收音机。整机安装完毕后有一个调试灵敏度的程序，因为都是在学生宿舍里焊接调试不可能有专门的高频信号发生器提供信号源。为了提高收音机灵敏度必须寻找现成稳定的微弱广播信号来调试。而苏联电台距离比较远，“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台标呼叫音乐声音清晰又没有背景干扰，因此被当作调试信号的首选。这个方法大家都在用，我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而且调试时我只注意他的音乐信号，从来没有收听过语言节目。

工宣队老师傅听完我的交代后说，你讲的我们不能全信，还要到同学们当中去调查，最后才能作结论。这样又耽误了好几天，工宣队再找我谈话，对我宣布：经过向全年级同学调查，你对问题的交代态度老实诚恳所讲符合实际情况。现决定不作为问题处理，可以参加毕业分配。接着就是报分配志愿。陕西西安、辽宁朝阳、贵州安顺这三处，我选了西安。

## 8，别了科大

68年12月下旬的科大校园好像一座忙碌的蜂巢，毕业学生犹如辛勤的蜜蜂一样在图书馆、食堂、财务科、保卫处等多个节点之间匆忙的奔波。只有还了图书、结清伙食、偿还欠款和所借物品以后才可以办理户口迁移，最后到学生处开具毕业分配派遣证并到财务领取工资手续和派遣差旅费。我到财务科办理清欠时查出65年去顺义参加四清曾经借过军装棉袄一件。办事人员问我，你是还物还是付款？棉军装当时我就穿在身上，虽说已经很旧但是脱了还物我就是严冬北风中的苦寒伶仃了。那就付款吧，交了10元。在保卫处办理户口迁移时，我要求把名字改回去，还叫江明德。办事人员说，前年也是你跑来要求改的江晓东，怎么才过两年又要改回去？我无奈苦笑地央求他：江晓东不是已经被革命群众打倒了吗，那还是让原来的江明德回来吧。于是历史翻篇，被废弃两年的江明德又登户册重回人间。

1968年12月26日是我毕业离校的前一天，前两天听谣传说六系食堂26号中午要吃“忆苦饭”，那天为了躲这一顿的吃糠咽菜，上午我跟同宿舍同学登了三轮去卖废品，车上装的是书籍报纸和旧棉花胎。在玉泉路南头的收购站卖完废品就在那里小饭店吃了午餐，两个人还喝了一瓶葡萄酒。回到学校歪歪倒倒，躺在宿舍的床铺上睁眼看一片雾蒙蒙，好像罩了纱布蚊帐。这是我平生头一回尝试醉酒的感觉。一觉醒来听同学们说，你们亏了中午不是忆苦，我们吃的是思甜饭。嗨，你说我有多糊涂，12月26号是领袖的生日。听信谣言害我错过一顿好饭菜！

12月27日傍晚，我惜别母校登上北京至西安的直达列车。走出校门，就是开始了我自立人生的旅程。别了，中国科大；别了，六年踟蹰的校园！别了，玉泉路；别了，我兄弟情谊的同窗学友！

（未完待续）

□ 原载《我们心中的科大》文集，2018年9月

~~~~~

## 【难忘岁月】

### 重回北大的日子

• 胡宗式 •

#### 一、我被押回北大

我是物理系60级学生，在文革中曾担任新北大公社动态组组长。1968年初，我被分配到宝鸡九零二厂。1971年1月中旬，在南京岳母家，接到厂里发来的催我回厂的电报。2月19日上午我回到厂里，当天晚上，厂里派吴长顺陪同北大的李桂勋一起“护送”我去北京。21日凌晨2点左右到了北大，上午10点，住进43楼211室，窗上钉了木条，门上贴的大标语是：誓与“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血战到底！

物理系组成了20多人的专案组，成员有工军宣队队员、学员和教员，组长张万祥、副组长庄逢源。1971年2月27日晚上9点多，系宣传队指导员杨宗佑来到我住的屋里，他说：“你来了一个星期了，我们没有动你，是叫你先安一下心。过去说我们掌握你70%，现在可以说掌握你100%。打开窗子说亮话吧，你是‘五·一六’并且是骨干。是坦白呢，还是抗拒？从现在起和你进入短兵相接的阶段。你倒霉就倒霉在聂元梓身上，你知道她在‘五·一六’集团里处在什么地位吗？她不用填表，她有批准权。你以为材料烧了就查不出来吗？名册烧了，组织部长还在嘛！我不要你现在表态，你先考虑一下”。

这一天晚上让我11点多睡觉了，比原来提前两个多小时。我多日缺觉，躺下就着了。专案组的解放军学员刘文振和另一个人一夜没睡，在旁边观察我。第二天早上5点多把我叫起来后，刘文振问：“想得怎么样了？”我说：“不是！”刘文振气炸了：“啊！我们等你一夜，你可倒好，两个字完了。校领导说要把你培养成典型，给你机会你不要！”

1971年2月24日、26日和3月4日，北大开了三次大会，都让我到办公楼的主会场去参加。前两次是批判聂元梓的。3月4日是坦白大会，会上牛辉林等人坦白。牛辉林说：“是洪涛发展我参加了‘五·一六’。我攻击江青同志，还发表反军演说，在王、关、戚的操纵下在北大策划武斗”。牛辉林重点说不要搞攻守同盟：“那是建立在私字上的，是靠不住的。过去我把名单交给了洪涛，现在我把名单交给了工宣队。……赶快坦白吧！”散会后，专案组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对立派的头头是‘五·一六’，我能有什么想法。”

1971年3月底的一天，杨宗佑又找我谈话。他说：“这一个月没有动你，你别以为没事了。毛主席的政策一贯是一网打尽。这些天我们就做的这个工作。你是‘五·一六’，你不是首恶，但你是骨干。一个也跑不了。你们是反王、关、戚的？你们反王、关、戚是个大阴谋。北大是毛主席抓的点，是个先进典型。它好在哪儿，好就好在稳准狠，一打一个准……。”

## 二、专案组批判我的几个问题

北大工宣队罗列的“五·一六”罪行，具体问题、事件或口号有：（1）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2）攻击谢富治，（3）揪军内一小撮，（4）揪刘火线，（5）西山游行（揪陈再道），（6）午门抗缅大会，（7）007密令，（8）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9）上揪下扫，（10）17年掌权的经验不能再用了。

物理系专案组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对我进行了重点进攻和批判：

### 1，文杰事件

1968年4月27日上午10点左右，无线电系62级学生殷文杰，途径44楼时，有人喊了一声“他是‘过大江’的！”钢一连的两个人，上去堵住并用扎枪刺他。此时，我和同组的章铎，正和中国人民大学搞外联的女教师盛学韞在附近谈话，见到刺人以后，我连忙上去阻拦。后来我把伤者送721医院抢救，并参与了殷文杰死亡后相关事项的处理，写有调查报告交给了校文革。

专案组以殷文杰事件为突破口对我施加压力。他们在两个细节上做文章：一是在4月30日我给上海打电话，与家属谈话说火化的事，他的姐姐同意了，后来他姐夫来电话说不同意，我说已经通知火葬场了。殷文杰的姐夫给工宣队的证明中否认家属曾同意火化；二是校

医院的大夫给工宣队开的证明是：“送721医院前人已死。”而同一大夫开给我的证明是：“心跳微弱”，还当着我的面打了强心针。他们据此说我不老实、顽固，根本不许我讲话。我只要一开口，他们就说：“你还狡辩！”并强迫我承认“是杀人凶手，聂元梓也是杀人凶手。”我说：“我是救人的！”他们说：“包庇杀人凶手的就是凶手。”“你是救人的？救人的，人怎么死了！”还要我交待聂元梓、孙蓬一是怎么指使的，并说：“聂元梓也是凶手。杀人凶手难道就要亲手杀人吗？蒋介石亲手杀人吗？他是不是凶手？”

对我写的调查报告，他们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 2，怀疑康生

“怀疑康生是关锋的后台”是我主动说的。当时这样的传说很普遍。其实，“康生是关锋的后台”这句话，是康生自己说的，他在师大的一次讲话中说：“有人说我是关锋的后台，我就是关锋的后台。”

## 3，反对林彪

在文革中我没有产生过对林彪的怀疑。审查时说我反林彪，那是抓住一点无限上纲。1967年发生5·13事件，军内两派发生冲突。林彪是支持三军演出的。演出的一派叫“三军”，另一派被称为“冲派”，在演出之前，新北大公社内部，对军内文革派别的支持分为三派：曹广志为首的文艺批判战斗团支持“三军”；动态组支持“二筹”；外联组支持“一筹”（北京高校的组织大多支持“一筹”）。5·13事件后“一筹”和“二筹”联合起来成为“冲派”。曹广志在演出现场代表北大支持“三军”演出，这引起“冲派”的不满。经外联组联系，聂元梓、外联组两人和我与5月25日左右到军艺“星火燎原”，修复关系。

专案组的人说：“明知林彪表态了，你们还要到‘星火燎原’去！”

在审查期间我说过这样的话：“说杨成武勾结傅崇碧要夺谢富治的权，我从来没有这个感觉。”专案组说：“你这是对抗林彪的1968年3月24日讲话，不是反林彪又是什么？”

## 4，攻击谢富治

清查中，用以压我的主要问题是“反谢”。

1970年底的一天，在宝鸡的北大同学聚会上，校友祁念曾说：“北京工代会的一个人到宝鸡出差，他说：‘我最近见到一位中央高级首长，我问谢副总理的情况。首长说，谢富治是5·16的总后台，现在对外就说他病了’”。我对谢富治确有不好的看法，刚被押回学校时我就承认了这一点。

1971年的五一节晚，专案组让我去看电视。晚会结束时，我从电视中看到毛主席，心情非常激动，真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心中在问“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当看管人员问我有什么想法时，我说：“我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

专案组认为可以趁我感动之时攻下我的“五·一六”问题，便于5月3日又开始对我进攻。因为1967年我们反对王、关、戚是人所皆知的事情，他们就企图通过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来说明戚本禹是聂元梓的后台。在5月4日的会上，专案组说：“聂元梓提出了三个‘五·一六’口号：上揪下扫（上揪就是要揪总理）、十七年掌权的经验不能用了、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我说：“十七年掌权的经验不能用了的提法是不对的，但这是谢副总理说的。上揪下扫的口号，上揪，当时就是指揪李雪峰，不是总理。‘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口号，根本不是聂元梓的口号。我于1967年6月中旬上报的材料《与许维刚谈话纪要》明明白白写着‘现在社会上的斗争，反映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你们北大这一次站错了队，你们站在了总理的一边’”。

在5月5日和6日的会上，又增加了杨、余、傅是我们后台的内容。说杨成武是后台只有一条事实，就是杨成武说：“崔雄昆（北大教务长，亮相支持校文革）是好人好干部。”（文革前，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上北大读书，是杨成武来北大找崔雄昆办的。）我说：“这至多可以说在干部问题上上了他的当”。说“傅崇碧是我们的后台”也只有一条，即林彪在1968年3月24日讲了“杨成武勾结傅崇碧要夺谢富治的权”。他们说：“傅崇碧反谢你们也反谢，就是一伙的。”我说：“我们是和傅崇碧斗争的。在高校学习班上，他动员那么多的单位压北大，署名是北京卫戍区的‘打倒聂元梓！’的标语我是亲眼见的。”

专案组的人说，谢副总理是坚决同“五·一六”作斗争的，你们搞“1·15事件”调查就是为了反谢。工宣队的赵××还说：“当然我们也不认为你想当北京市革委会主任，主任只有一个，聂元梓当了，你就当不了了，但是可以弄个小官当当”，“联系你的家庭出身，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毛主席林副主席任命的北京市革委会主任，你反对？！”

我越听越生气，决心在这个问题上和他们进行一次较量，让他们看一看，我为什么反谢。1971年5月9日我奋笔疾书，写了《陈伯达、谢富治是“五·一六”总后台》的材料。这是一次不顾后果、心血来潮的冲动，也给我带来了很大被动。这份材料后来被专案组称为“5·9大毒草”。

### 三、在小型批判会上我与专案组的交锋

1971年6月6日，中央台广播了谢富治在医院拜会齐奥塞斯库的消息，我感到一场风暴要来了。6月12日，专案组以泰山压顶之势，对我进行批判，说我在审查期间竟敢跳出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表示要逐条批我的“5·9材料”。

6月13日，他们选择了“5·9材料”中提到的一条，即北京日报在1967年9月某天有一通栏标题：“旧话不再提，旧账不再算，责任不再追，共同朝前看”。我说这是右倾口号，抹煞是非界限，搞阶级调和。专案组说口号是对的，“是适用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结果”。

专案组问：“你们当时怎么提的？实际情况呢？”我说：“我们当时的提法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按阶级按系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我们有吃掉井冈山的想法，但是在口号上没有错。”他们引用许多毛主席的语录，用来论证口号是正确的。当有人提到毛主席说：“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时，我接着就说：“这就是说，旧话还得提，旧账还得算。”所谓的逐条批驳，到此为止。



我在5·9材料中写了“我反谢是从1·15事件开始的”。为了批驳我，专案组费尽了心机。刘文振问我：“说公安部某负责人是谢富治，毛主席语录上有这么一条吗？”我说：“没有。”刘文振说：“那你怎么相信呢？”

针对他们说“聂元梓干的都是坏事”这句话，我说“对聂元梓要一分为二”。刘文振马上反驳我：“难道对美帝国主义也要一分为二吗？”我瞪了他一眼，心里想，还是学毛著的积极分子呢，太遗憾了。毛主席语录上没有“公安部某负责人是谢富治”，但却有对帝国主义要一分为二的一条。1958年12月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上，毛主席讲：“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对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

在一次小型批判会上，专案组李××说：“聂元梓所做的一切都是在黑后台指示下干的。”我立即反驳：“这么讲不对！”她马上改口：“聂元梓在黑后台的指示下，干了许多坏事。”我说：“这么说可以。”他们感到不对劲，立刻一片口号，想把我的气势压下去，会议当然也没有再开下去。

到了7月4日，我感到再坚持下去没有什么好处，就写了一份“认罪书”。他们当然不能罢休。7月8日，专案组又搞我的“五·一六”问题：“既要认罪就要彻底，只交待罪行，不交待组织是不行的”。当说到我在1·15事件问题上搞黑材料，以假乱真时，我说：“因1·15事件档案丢失，我们在台港澳的一些地下工作者因而失去了生命。听到这样的消息，难道你们的心里不难过吗？”他们说：“我们也认为1·15事件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我说：“从来没有见到你们表示过义愤！”这下子可把他们惹火了，立即取消了我的劳动和看报的权利，接着又是一轮批判。

1971年7月10日，学员周志强值班，他与我有一段对话：

周：“胡宗式，你交待得怎么样了？”  
答：“你们去了两个多月，不了解情况。”  
周：“怎么，走了两个多月就不了解情况了？”  
答：“我说了，谢富治是‘五·一六’的总后台。”  
周：“那还用你说，早就知道了。”  
我说：“我这样说是确切消息来源的。”  
周：“那当然是有消息来源的，哪能随便说。”  
答：“可是现在却叫我挖反动思想。”  
周：“那你就好好地挖一下反动思想吧。”  
周志强的话给了我一张王牌。

#### 四、我经历的三次全系批判大会

1971年9月9日、10日、11日连续三天召开全系大会批判我。黑板上写着：彻底批判胡宗式的反革命罪行！

事前规定我不许说话，不许喊口号，不许举手。先让我在门外等着，喊了一遍口号以后说：“把胡宗式带上来！”让我进入。

9日批判我“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

第一个发言的是一般而论，第二个发言批我“反江青”。他先泛泛地说“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如何仇恨江青同志，具体提到我的就是一件事：我说1968年3月8日，江青讲“你们为什么老是抓住王、关、戚不放呢，王、关、戚后面还有大的吗？”发言者说：“骗子给聂元梓黑指示，大反谢副总理，胡宗式却嫁祸于江青同志。”我听到这里笑了笑，把头一扭。第三个发言批判我反总理，说：“胡宗式勾结湖南某组织的坏头头炮制了所谓的007密令。”他还造谣说：“胡宗式拿到这份材料，对聂元梓说：‘刘少奇一类的政治骗子（指陈伯达）说这份材料很重要’”。谈到“与许维纲谈话记要”时，说这是“以调查社会上反总理的情况为名，搜集整理总理的黑材料上报给黑后台。”听到这里，我对他们的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做法实在不能容忍，把头一扬，大声地说：“我从来没有反过总理！”这时全场一片口号，想以势压我。一位学员跑上来，用手压我的头，压下去我抬起来，一共三次。

10日召开的第二次大会，批我反军。在“聂元梓、胡宗式之流……”的名义下，把许多事都加在我的身上。他们造谣说我“反对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早在67年4月就说‘现在是军内造反派受压’。”他们还污蔑我“在电报大楼大反通讯兵”。散会以后，专案组找我谈话。我批驳他们：“说我在67年4月说‘现在是军内造反派受压’，我根本没讲过这样的话，即使讲了这话也不是错，那时受压的正是‘三军’。说我在电报大楼反通讯兵，这怎么可能呢？通讯兵在那支持‘红讯’，我们在那也支持‘红讯’”。

11日第三次批判我的大会，重点是反王、关、戚和二月逆流问题。

反对王力、关锋及其在基层的势力吴传启一伙，是聂元梓领导下北大的一次重大行动。当时这一伙人如日中天，反对他们有很大的风险。1967年4月10日聂元梓和孙蓬一到钓鱼台，面见江青和陈伯达，告王力、关锋“结党营私”。此次接见，江青讲了一句：“不是早就打过招呼了吗？要和吴传启在政治上划清界限。”针对这句话，大会的发言者说：“聂元梓造江青同志的谣。”又说：“你们反王、关、戚是搞政治赌博，靠的是先验论，是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因为不让我发言，所以我只能用肢体语言表示我的不屑。

1967年春，反击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在文革中是重大的事件。后来了解了一些中央会议的情况，我认为我们没有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北大在反击二月逆流的保守态度，动态组要负很大责任，初回北大我也是这样检查的。会上，专案组的人说：“谭震林伸到北大的黑手已经很清楚了，就是通过江一真——胡宗式——聂元梓，你们就是二月逆流派！”

## 五、校领导找我谈话

1971年9月13日晚上，在办公楼的一个房间里，校领导找我谈话。参加这次谈话的有校领导三人、校专案组一人（他们都穿军装，姓名没有介绍），还有系专案组的张万祥、庄逢源。他们问我三次大会以后有什么想法。我说：“关于007密令问题，我拿到的这份材料，上面只写到刘志坚曾看过这份材料（密令），而我看到材料的时候，刘志坚已经倒台了，我怎么可能讲陈伯达说这份材料很重要呢？对这份材料，我当时已写明‘这是对总理的陷害’。”校领导说：“你不反总理？但是这材料是从戚本禹的办公室里抄出来的，签着你的大名，你还说什么？”我说：“我当时是上交中央文革的，而不是上交戚本禹的。如果说，我写了交戚本禹，那么尽管是在67年4月，也算我反总理！”“我把与许维纲的谈话写成材料，上报给总理和江青等首长，这怎么叫反总理呢？许维纲说：‘这一次你们北大站错了队，站在了总理的一边。’说得再明确不过了，怎么能推论出我们是反总理呢。”我又说：“在67年5月中旬，我到中南海对总理驻交通部的联络员讲‘我们发现了社会上一

个反总理的集团，就是学部联队、师大井冈山等组成的团伙，每一次总理讲到余秋里、李先念、陈毅问题，他们都出来唱反调……’。这反映了我们对总理的态度。”

一位领导说：“说反谢就是反革命，你想不通，难道反谢是革命的？”听到这里我说：“那么我再讲一件事”。我讲了7月10日与学员周志强的对话，讲完之后，有一位插话：“你说‘我说了谢富治是五·一六的总后台。’他说‘这还用你说？早就知道了。’是这样吗？”我回答：“是这样。这段对话，我以我的脑袋来保证，一个字不差。”他们问我：“你讲这些目的是什么？”我说：“为我自己作些辩解。”校专案组的人说：“今天校首长找你，机会很难得，你应当珍视，不要为自己做什么辩解。”首席校领导说：“今天找你还是要挽救你。你的态度很不好，在北大是出奇的，在北京市是少有的。三天大会我们都参加了，坐在后面，你看你的样子，听说你在学生时代就高傲自大，目空一切。但是我们还要按照党的政策，挽救可以挽救的人，你还很年轻，才30多岁，还可以为人民做点事。你自己也要为你的前途着想，要考虑一下到底走什么路，是否要和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彻底划清界线。”我没吭声，停了一会儿他又说：“我们也不要你马上回答，回去以后好好地想一下。”

事后，庄逢源要我把与周志强的对话写成材料，并叮嘱材料只能交给他和张万祥。

## 六、林彪又成了我们的后台

校领导找我谈话的时间是1971年9月13日。过了两天，学校早晨广播的开始曲，变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判定中央出了大事，于是很注意听广播和看报纸。到了9月底，我猜到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人出问题了，但没有想到林彪会出问题。10月10日，这一天是星期天，听到看守我的两个年青人的小声议论：“不是亲密战友吗？”我一下子明白了：林彪出事了。10月30日全校传达中央文件，听说当时物理系只有叶企孙和我不能听传达。

1972年1月10日，张万祥、庄逢源来到我的宿舍，庄逢源说：“现在组织上正式通知你，通过一年多的批修整风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彻底揭发了林陈一伙叛党叛国的罪行。”这时他们把以前说我如何反林彪，他们是多么热爱等等全都丢在脑后，竟然这样说：“这一下你们的后台更清楚了！”

林彪事件以后，清查“五·一六”运动没有办法再搞下去了，实际上是逐渐收尾。被押回学校参加清查的人，大部分于1972年回原单位了。对于我，没有再开批判会，基本上是参加劳动，有时叫写一些材料，偶尔帮助物理系的青工补习文化课。自1972年春天以后，虽然对我不再看管了，但如果离开北大，仍要请假。1972年在北京展览馆有英国工业展览会，我向亲戚要了一张票去看了，专案组追问我票是从哪来的？1973年春节我要求回天津探亲，但得到的答复是：等你回单位后再探亲吧。

## 七、对我的审查结论

1973年3月30日晚，我在全系大会上向群众作检查，主要内容是：1.追随聂元梓反对谢副总理；2.对康老发生过怀疑；3.处理殷文杰事件时的错误（稿子是专案组批准的）。我检查之后三位群众分别发言，然后由系总支第一副书记曹芝圃宣布结论：“对胡宗式的审查结束了。今天他向群众作了检查，我们认为这个检查还是很深刻的，但是也看到认识有了提高。根据党的给出路的政策，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组织上认为，胡宗式是受聂元梓蒙蔽，犯政治错误。不予处分，不记档案，不作书面结论。”

大会以后，工宣队领导和曹芝圃找我谈话。我说：“去年9月份，工宣队高师傅找我谈话时，我曾提出一个问题，我反王、关、戚如何评价？我反‘五·一六’如何评价？在这个问题上，专案组的某些同志发表了许多错误的观点，说我反王、关、戚是靠的先验论，搞的政治赌博，反潘、吴是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过去也进行过争论。”曹芝圃用手敲椅子的扶手，很生气地说：“这是审查，不是争论。”我说：“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争论。现在不是号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识别和抵制刘少奇一类骗子嘛。我依靠毛泽东思想识别和抵制了王、关、戚，但是结果怎样呢？”

1973年4月5日，由张万祥和庄逢源送我回厂。

□ 来源：《风雨未名湖——北大老五届往事》，张从、奚学瑶、郑振卿主编，中国传记出版社，2018年2月

~~~~~

### 【往事非烟】

#### 冀朝铸回忆录（摘译之二）

• 冀朝铸 •

（本文摘译自：Ji Chaozhu: The Man on Mao's Right）

（上接 z k 1 8 1 0 c）

#### ◇ 中美关系的启动（之三）

基辛格登上了一架巴基斯坦波音707客机，这飞机刚从北京回来，机上载有陪伴基辛格前往北京的人员，包括翻译唐闻生在内。至于我，亦已和其他主要官员先期等候在钓鱼台国宾馆。妻子向同并不知道我在这里，还以为我在地球另一面工作。飞机降落后，缓缓驶到机场一个不公开的地方。在这里，我们的代表迎接基辛格一行的到来。叶剑英，政治局的资深成员，和我陪伴基辛格到国宾馆。我们乘坐的是黑色红旗牌轿车，窗帘闭得严严实实。一路上，叶帅对基辛格没有多少言语，只说周总理会在当天稍后接见他。

当天下午，周总理来到国宾馆。由于得到预先通知，基辛格等已在门前恭候。当周总理下车时，基辛格显得有点紧张，但总理的微笑以及从容不迫的态度使气氛缓和起来。基辛格伸出手，总理和他握手，然后两人一起进入客厅。吃过茶和寒暄后，双方连同各自的随从走进隔壁的会议室。会议开始时，周总理先致欢迎辞，然后请基辛格讲话。基辛格从他的公事包拿出一叠厚厚的、早已打好字的纸张，翻了一会，然后开始念。至于总理，则面前只放了一张空白的纸。基辛格顺畅地读了好几分钟，然后念到了这一句：“许多游客来到这个美丽，然而对我们说是神秘的地方。”这时，总理微笑着打断他的话：“当你认识了这地方后，你便不会像以前那样觉得神秘了。”这话把彼此的距离拉近起来。

第一天的会谈，（其中包括一个工作午餐）差不多持续了七个小时。会议结束时，已到了午夜时分，总理照例还要到中南海向主席报告。由于毛和周两人都是通宵工作，于是第二天早上基辛格被安排参观紫禁城。

唐闻生和我轮流为这个会议作翻译。当基辛格（以及后来的尼克松总统）往外参观名胜古迹时，通常是由我负责翻译。在第二天的会谈中，总理列出中美的所有重大分歧。他问，彼此的分歧既然这么严重，是不是还有需要邀请美国总统来中国探访呢？对此问题，基辛格似乎有点措手不及，但他随即冷静地回答，是否有此需要，由中方来考虑决定。吃午饭的时候，周总理对文化大革命作了很详细的介绍。基辛格告诉总理，尼克松总统认为这是中国内部的事。但总理说，要了解中国，必须了解文化大革命。在他的长篇叙述中，周总理似乎就不能紧跟毛主席的思想而批评自己。后来我细想一想，这可能是总理对基辛格暗示，他并不完全同意毛泽东的主张。

吃过午饭后，会谈继续。周总理告诉基辛格下一年的暑天，即1972年的暑天，可能是尼克松访问中国的适当时机。基辛格绽开了笑容，他不再担心了，很明显周恩来先前的关于中美分歧的话不是当真的。最后，双方同意把访问订于1972年的春天，这样不会妨碍美国的大选活动。在怎样宣布这个消息的谈判中，有两个主要考虑。第一，尼克松的访问是尼克松本人要求的，还是中国提出邀请的？这涉及一个重大的“面子”问题。第二，而这对中国更为重要，提不提台湾和怎样去提？如果不解决这两个问题，联合公告便发不出；联合公告发不出，尼克松访华便不能成行。

第二天早上，外交部副部长黄华提出了一个新的联合公告文本，以在双方不失面子的情况下解决上述两个困难。基辛格作了一些细微的改动便接受了。这个联合公告震动了整个世界：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公告的第一段解决了第一个困难。使用“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间接的表达方式，双方很巧妙地避开了谁采取主动的问题。第二段没有提到台湾是中国的一个退让，因为任何美国改变支持台湾的暗示，都会在大选中置尼克松于不利的地位：他的对手会乘机攻击他对共产国家不够强硬。自然，“双方关心的问题”在定义上可以包括台湾在内。在外交实务中，任何一个字眼都重要，因此都要计较和争辩。

#### ◇ 中美关系的启动（之四）

访华公告发表后，最受这个公告震荡的国家，可能是日本，美国的主要亚洲盟友。然而，虽然日本可能因这个消息而感到不快，但她迅速反应，立即承认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合法政府，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许多其他国家都不甘后人，纷纷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月间，台湾失去了她在联合国的地位。有分参与尼克松访华谈判的黄华，成为联合国中国代表团的团长。三个月之后，基辛格再次访华，但这次是公开的了。他此行的目的，是准备尼克松访华后的联合公报。我参与了联合公报的准备和定稿的讨论。

正当我们的对外发展进行得十分顺利的时候，国内发生了一宗当代中国史上最为震撼人心的事。林彪，国家副主席和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竟然叛逃中国。关于此事有许多解说，但基本事实是林彪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而周总理对他亦没有使用价值。根据一个传说，该年较早的时候，林彪曾试图暗杀总理。林彪的儿子，一个空军将官，涉及暗杀毛泽东的不可

思议的阴谋。也有传言说，林彪曾意图在广州设立另一个政权。根据我从政府内部和外部所得到的消息，事实是林彪知道他已内定为被清算的对象，而他不想坐以待毙。他的儿子安排一架飞机，从北京飞到他在度假的海滨住地。飞机载了林彪、他的妻子和司机。林家计划沿着最短的航线逃离中国，即北向俄罗斯飞行。

林彪的儿子调动飞机的消息，传到了周总理处，周立即告知毛泽东，并请示是否把飞机打下来。毛说：“让他去吧！”这是一个很高明的决定，因为把共产党副主席打下来极可能被视为一宗谋杀，可能引发动乱。然而，命运之神开了个玩笑，飞机烧光了汽油，紧急降落时堕毁在外蒙，机上所有人全部死亡。苏联的法医证明了死者的身份。

经此事后，毛泽东陷入了严重的抑郁中。他的老同志和亲密战友几乎无一幸免地被打倒为叛徒、假马克思主义者、反革命，或被控以各种各样的政治罪名。国家的知识分子在鸣放和反右运动中被搞得遍体鳞伤。文化大革命摧残了千百万人的生命，以及砸烂了党的体制。仍然对毛泽东保持忠心的人，是那些当过红卫兵的年轻人，以及他的亲信。他的亲信个个都野心勃勃，觊觎权力，并利用当时不正常的政治气氛清除政敌。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出现的场合，是在电视上会见北越新总理。看到这纪录片的人都惊讶地发现毛泽东老了许多。他的肩膀佝偻着，双腿无力，摇晃不定。1972年1月，我敬爱得像父亲一样的陈毅元帅因癌病逝世。我如丧考妣，哭得像泪人一样。陈毅是文革的另一无辜受害者，死的时候尚未平反。在零度以下的天气中，毛泽东亲临陈毅的丧礼。他看起来举步维艰。根据在场的人所述，毛的情况很坏，非常衰弱。告别礼完了之后，他对周总理说：“我不行了，要靠你了。……我死了之后，一切都交给你了。这算是我的遗嘱吧。”

周总理说不好，但毛的妻子江青疯了起来。她是一个心怀叵测、专搞阴谋的人，意图在毛死后继承毛的地位，或指定毛的继承人。她认为毛的周围有一个“间谍网”。由于她是政治局成员，她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深夜进行，其间她宣称“主席身体很好”，并指责周恩来“强迫主席交权力给你”。其实，自从文革开始，江青便阴谋中伤总理。现在更是关键的时候了，因为倘若毛泽东这时逝世并把权力交给总理的话，江青和她一帮的日子便不好过。因此她竭力打击周恩来及周恩来的人，包括我在内。

在这当儿，亦即在毛的身体发出警号及林彪事件发生仅一个月之后，基辛格来了。这是他第二次来北京，这时——

1971年秋天——中国的情况十分紧张。美国代表团入住宾馆之后，他们发觉迎接他们的，是张贴在他们房间墙上的反美口号和标语。谁命令张贴这些标语？无人知道，也无人承认。周总理不会这样做，而我相信也不大可能是毛的意思。幕后黑手应该是江青，她现在是在进行殊死战，而她不希望基辛格访问成功，因为这会给周恩来脸上贴金。

基辛格明显地因这个耻辱而愠怒，但他把这处理得大方得体，符合他的作风。他命团员把所有的大字报和标语拿下来，集中在一起，送往我们的礼宾处。他并给足我们面子，说这可能是上一团人留下来的。双方的紧张关系，在周恩来当天稍后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美代表团时立即被消解了。周在这个场合发挥他无比的魅力和亲和感。在接着的酒会中，他致辞欢迎美国客人。这个欢迎辞从未正式发表，它是基辛格第二次访问成功的基础：

“经过了二十二年的分隔后，中美关系现在又展开了一个新的篇章，而这要归功于毛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当然，还必须有一个领路人，这人便是基辛格博士。他勇敢地秘密访问中国，这个所谓神秘的地方。

“中美人民同是伟大的人民。虽然中美两国被辽阔的太平洋所分隔，但是友谊把我们两国人民连接起来。今年，在接待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之后，我们还接待了好些美国朋友。我们希望以新的精神迎接新的时代。

“我建议为伟大的美国人民和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友谊干杯，为基辛格博士和所有其他朋友的健康乾杯。”

晚宴之后，周总理穿梭宴会厅和基辛格代表团中所有的人碰杯，包括基辛格的各个秘书和飞行人员。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周恩来和基辛格的合照，这是美国官员和中国官员的第一张合照。

在公报上、怎样提台湾仍然是一个大问题。还是基辛格有办法。他用了以下的表述方式解决了这一问题：“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虽然中美公报的其他内容还须修改，但上述聪明的说法成为经典的表达方式。

会谈后，正当基辛格的飞机徐徐驶往起飞跑道结束他的第二次访华旅程的时候，消息传来台湾已被取消她的联合国席位，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替。我们每人兴高采烈，但是无暇庆祝，因为我们要马上装备几个月之后的美国总统的正式访问。

#### ◇ 外交部的两个女人（一）

短短的时间，发生了多么大的变迁！

三年前当尼克松就任总统时，他站在白宫前的石阶上宣称，他的愿望是看到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无论是大民族还是小民族，生活在愤怒的隔离中。”那时，人民日报即时作出反应，骂道：“尼克松的头部已套在绳索中，竟然还有心思讲将来的问题。……他的一只脚已踏进坟墓中，还在自我陶醉，讲天堂的美梦。这是一个垂死的阶级的呻吟和挣扎。”

三年之后，一只脚踏进坟墓的，是毛泽东。那时政治斗争非常激烈，在决定他身后谁继承他的大位的问题。有许多年，毛泽东总在谈他的身后事，好像他的末日快将来临一样。我曾经为他在许多会见外国政要和名人的场合中作翻译，这些人都希望和他谈实质性的问题。但毛泽东认为自己是哲学家，而周恩来才是干实事的经理。对于他不想讨论的问题，毛泽东惯用的手法，是摆摆手，说：“哦，我还要担心什么？老天爷正准备给我请帖呢！”暗示他患上不治之症，国家问题不受他控制了。

这是他的政治权术。确实，1971年年末，他真是好像收到了老天爷的请帖，而即使捱过了1971年，他的时日也好像不多了。可是，当尼克松访华的日期愈来愈接近时，毛泽东竟然像打了强心针一样，整个人振奋起来，就像一个过气的、失去状态的拳王要为争标作最后的努力一样。他的心情好了。他同意医生治理他的肺炎和心脏病。他练习站高坐低，并在扶持之下走几步。他对于能够迎接尼克松的到来感觉愈来愈兴奋，因为这又是历史的契机，使他青史留名。像他研究过并加以模仿的古时帝王一样，他的名字会地老天荒而不堕。

但是长时间的压力和抽烟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他全身浮肿，想吐痰也没有气力。他对传统医术有戒心，并坚持认为对于患了癌症的人，最好不要让他知道实况。毛说：“不要告诉这个病人病况，不要做手术，这样他可以活得长一些，可以多干活。”基本上，毛的侍从和党的高级官员需要进行重大手术时，都要得到毛的批准。当康生，毛的老朋友和保安头子，被诊断患上膀胱癌时，毛命令免除他接受手术“之苦”。不论毛此举是出于好意还是意图除掉康生，几年之后，康生一命呜呼了。康生死后，许多人控诉他以毛的名义犯下许多迫害无辜和残害同志的事情。

正当这个时候，我也遇到很大的政治压力。文革一开始的时候，我便已经靠边站了。后来，姚登山冲击外国使馆以及文革中的其他的极左行为，使我得以平反，并升了职。跟我一起平反的，还有许多受尽红卫兵凌辱的老干部和老领导。即使毛泽东自己，也重新召回一些被错误下放或开除党籍的高级官员。

但在外交部内，政治风云仍在激荡，没有平息。一些同我在外交部工作的极端分子和嫉妒我的人，不断批评我对反革命分子太过软弱。可是，我跟我的其他同僚不同，我是不受控制的人，而且不容易被打倒，因为我得到周总理的全面信任。我在制定国家外交政策中的角色日渐加重。在政府里面，没有那一个人像我那样长时间参与周总理和外人的会谈。我对周总理了如指掌，我熟悉他每一个手势，我也知道什么时候他臂弯的旧患又令他痛楚。此外，我还是政府内唯一可以和基辛格闲话家常的人，就像哈佛的学生在饭厅里闲谈一样，而周总理对此完全信任我。这使我成为一个不能缺少的人。还不止此，我成为周总理在外交部的耳目。他经常问我有什么事情发生、谁在背后说谁的坏话、他的敌人现在有什么动作、我们的外交政策现在是怎样，等等。我时常给他提供消息，并且跟他说现在有什么好人正受到攻击而需要保护。

我在外交部的主要对头人是唐闻生。

## ◇ 外交部的两个女人（二）

唐闻生现在直接替毛泽东工作，因此她属于江青一伙，成为毛的内线的一员。这些人都恐怕毛死后周恩来成为他的继承人。周总理背后抗拒毛的命令，保护一些政治上被打倒的人。而对于江青，他曾当面拒绝透露她要追寻的人的去向。江青攻击周恩来架空毛主席，虽然她内心非常清楚，周恩来完全没有在毛死后取代毛的位置的意思。毛是中国的严父，而周是中国的慈母。可是，周已经七十四岁，岁月的痕迹已开始在他身上出现。事实上，我和我的同僚已在担心他的情况，因为他的身体日渐消瘦。

另一方面，唐闻生充当了江青在外交部的耳目，协助江青知悉外交部的情况，以及打探周总理一派的活动。（当然包括我在内）

到后来，唐闻生更发展了王海容，外交部礼宾司的负责人以及毛泽东的孙侄女。这两人很快成为好朋友，经常对我的说话和行为挑骨头。她们两人年纪都约三十岁，在文革这场政治斗争中，竭力为毛、江、康生等人卖力。她俩是死死咬着我不放的可怕的敌人。

生活对我是复杂的，精神压力也是很大的。我现在协助外交部长黄华、副外长乔冠华和周恩来的特别顾问章文晋准备尼克松访华最后，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环节——访问后对外发表的联合公报。（即后来的上海公报）这份公报是到现在为止的中美关系的起点和基础，而其最初的草稿是由基辛格拟定的。



此时，毛泽东仍在锻炼身体以便能够站起来，及和尼克松进行会谈，而周恩来则召集他的团队做好准备，以使这个访问成功。一天，他集合我们，就过去的中美关系给我们作一个长篇的演讲。他说他认为中美两国应该一开始便是天然的盟友，但是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总是发生了阻滞而让机会溜走了。他希望这次走得正确。他提到美国的史迪威将军和赫尔利将军，这两国将军都曾经在战前和战争期间服役于中国。史迪威将军了解中国的情况，他对蒋介石的腐败政权并无好感。赫尔利将军是一个吹牛的人，他在没有预先通告的情况下突然造访延安。1945年，毛泽东、周恩来曾托赫尔利带信息给罗斯福总统：他们愿意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和罗斯福总统会面。如果需要的话，他们也可以到华盛顿去。当时，史迪威正在生病，由赫尔利递信是最方便的选择。苏联那时靠不住，毛、周认为和美国结盟是平衡苏联一个恰当的做法。可是赫尔利强烈反共，他没有转告信息，而罗斯福不久也去世了。

周说，另一个失去的机会是1949年刚刚解放后，那时苏联随同国民党逃走，反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和其他西方国家大使留下来。司徒雷登向毛、周转告一个重要消息：美国愿意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长期低息贷款二十亿美元。这数额对于一个贫穷国家例如中国来说，不啻是一个天文数字。但，司徒雷登没有亲自转述这个消息，而是委托一个中间人，一个可以接近毛、周的中国官员。正当这人动身启程前往北京的当天，恰巧是中共建党二十八周年纪念，毛泽东宣布与苏联结盟，苏联援助中国三亿美元。因此，司徒雷登的信息从没有递交中国。他立即被召回美国，而杜鲁门总统领导下的国务院因“失去”了中国而受到国内强烈的指责。接着是韩战的悲剧，中美在战场上交手。1954年的日内瓦和平谈判，上演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和周总理握手的一幕，因而中美关系无法发展。

但这是过去的事了，变化即将出现，而这变化在1972年二月廿一日的的一个灰暗阴冷的早上由美国飞机空军一号降落北京机场而启开序幕。在场的人不多，只包括十余个我方人员和一群报馆和电视台的记者和摄影师。然而，这情景全世界都透过电视即时观看了。

（未完待续）

□ 原载《北京之春》2013年7月号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